

中華書局出版

何寄彭 著

北宋的古文運動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華學術叢書

北宋的古文運動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北宋的古文運動/何寄澎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 6

(中華學術叢書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834 - 6

I. ①北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古文運動—研究—中國—北宋 IV. ①I209.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032470 號

中華學術叢書

北宋的古文運動

何寄澎 著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惠頓實業公司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張 12.125 插頁 5 字數 302,000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3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834 - 6

I · 2308 定價: 45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出版說明

自 1991 年王永興先生的《唐句檢制研究》、柳存仁先生的《和風堂文集》與項楚先生的《敦煌文學叢考》出版以來，《中華學術叢書》至今已走過了十五個年頭，已刊與將出的名家研究著作，也已接近二十種，並在海內外學界贏得了高度的贊譽。當前民族文化的復興已成為國家的文化戰略，而學術昌隆，正本清源，更是文化復興的前提，為此，本社決心花大力氣，通過相應的調整，來加強本叢書的出版力度。

《中華學術叢書》定位為海內外漢學界高端論著交流的平臺，以及時薈萃一流漢學研究著作為己任。她與集成性整理性質的《中華要籍集釋叢書》並列，將成為本社古籍整理與古籍研究的兩個核心品牌。

《中華學術叢書》將不限於原初以傳統漢學研究為主的格局；凡學殖豐厚、思想深刻、卓有創見的漢學研究，無論其方法是傳統的還是新潮的，其視角是單一學科的還是跨學科的，都將進入編者的視野。

《中華學術叢書》的作者，將由原來以大陸老一輩專家為主，而擴展為朝向一切術業有專攻的學者，她既為名家大師一生著作的集萃，也可以成為中青年俊彥頭角初露的溫床；她對於大陸、港澳臺乃至各國漢學家的優秀著作一視同仁，因此部分漢譯著作，也將適當採納。

《中華學術叢書》的形式，以專著、專史、專題論集為主，也適當

地採用“文存”的形態，如果有既合乎基本學術規範，而形式更有創新的著作，也不妨嘗試。

我們感謝已進入本叢書的各位專家的奉獻，感謝本叢書各個方面的熱誠讀者；我們更衷心地期盼與更廣大的作者群通力合作，共同打造好《中華學術叢書》這一知名品牌——爲了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二〇〇六年十一月

柯 序

文學運動顯然是一種遠比文學創作複雜的現象。但是文學創作原來就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，它的促發、產生、傳播與接受，其實無法不受流行的社會成規的影響，也必須透過種種社會的機制方才得以發生作用。因此，創作雖曰“創”作，其實泰半仍須是合於某種“典範”或“法式”之下的“創”作。只有少數的豪傑之士，不但超越了既有的成規，而且及身地使一己的寫作，成為取而代之的新的“法式”，因而自居於“典範”的地位，這樣就形成了所謂的“文學運動”。

每個時代的主盟文壇的人物，或大或小都在從事“文學運動”。文學史的重要工作之一，正在敘述探究這些大大小小的“文學運動”；所有的分期、分體以至各種風格的討論，尋繹的其實都是這些或顯或隱的運動與其成果。但是明顯自覺的文學運動，所提示給我們的，就不只是一般文學史中所常見的作品與風格而已，同時更是運動的過程、影響的因素與發展的規律。這樣的明顯自覺的文學運動，在中國文學史中屢見不鮮，但是就以影響之深遠長久而論，除了近代的“文學革命”外，當數唐宋的古文運動最為重要。

古文運動與白話文學運動所以重要，所以影響廣大，因為它們都不僅是文學的革命，也是書寫語言的革命，更是一種文化的革命。然而它們的成功，卻不在打、砸、搶、燒的激憤的破壞，或者政治權力的三令五申、威迫利誘；而是來自於其主張的合於社會轉變之時代需要，以及領導人物經由成功的創作所形成的“典範”作用，與其經由批評自覺所闡明的“法式”之確立，足為時人及後人仿效與遵循。

卡萊爾(Thomas Carlyle)“英雄與英雄崇拜”(Heros and Hero-Worship)所謂的“英雄”的創造世界新秩序,正是此義。

何寄澎先生的這本“北宋的古文運動”,雖然未在書名上強調,追索的卻正是這樣的兩個文化“英雄”——歐陽修與蘇軾,他們兩人所前倡後繼的最重要的文化事業。(歐、蘇二人的文學事業,其實更包括了宋詩風格的確立與宋詞意境的開拓,但影響到整個書寫與文化變革的卻是古文運動。)由於他們的提倡與“典範”,終於使得“古文”成爲一種平易自然,既切近於人們思感的心理歷程,卻又富於表現、溝通能力,足以適應多種體類之目的的書寫媒介,因而達到了“文”“道”融合,“文統”與“道統”合一的新的文化方向的開展。從此“文章”具有了“思想”的靈魂,“思想”也具有了藝術表現的體貌。正是另一次“文質彬彬”人文化成之理想的體現。即使在“文學革命”七十年後的今天,當我們回顧古典文化,亦不能不爲之崇仰讚歎,低迴不已。因此何先生在本書中對於他們承先啓後之事業的細按深究,就格外意義重大,充滿啓示。

“英雄”雖然創造時代,時代也同時造就“英雄”。因爲每一位文化“英雄”都有他們的先驅者,先行摸索了未來發展的方向。“英雄”們承繼了他們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,因而終於找到了真正可行的康莊大道。但是“英雄”之所以爲“英雄”,也正因他們不只是真理之坦途上的踽踽獨行的人物。——陶淵明或許在詩文上,走的正是文化理想最後會到達的真理之路。但是其意義卻要到了蘇東坡之後方才被體認,方才有重大的影響。因而陶淵明只是“先知”,但卻不是“英雄”。因爲他只是“頗示己志,忘懷得失,以此自終”地完成自己,卻未嘗努力去發起任何文學運動。——“英雄”之事業,正因爲他們不僅獨善其身,自我完成,而且更是能夠栖栖惶惶地接引同志,獎掖後進,甚至號召羣衆。因此他們不只影響久遠,成爲文化傳統中永不熄滅的火炬,而且更是開創了風雲際會的時代潮流的吹鼓手。雖然任何的運動,不論一時如何的盛況空前,往往在它成功地被納入

正典，成為傳統的一部分之後，終要逐漸地由社會的前景消褪，而融入了永恒的歷史背景。但是若無這種盛極一時的流行，就談不上所謂的明顯自覺的“運動”了，不論是文學的，或是文化的。

何先生很真切的掌握“文學運動”的既有前驅，復有同志，更有後繼與羣衆的特質，因此本書的注視的探照燈，一方面集中在前後兩位“英雄”的樞紐作用上，一方面亦不忘照射到北宋古文運動的前驅者：柳開、王禹偁、穆修、石介、尹洙、蘇舜欽以及歐陽修所提携的曾鞏、王安石、三蘇，以至蘇門的秦觀、晁補之、李廌、張耒，甚至私淑蘇文的唐庚、鮑由、李朴等身上。

何先生在時代背景上通觀叢列了北宋所有重要文化人物的言論，以證明“通經致用”正是時代心靈的共同傾向；並且以相同的方式證明了，當時一般對於“文”“道”觀念的理解，以及“文”“道”合一的要求。因而歸結到歐陽修的能夠“富有文采”地塑造出一種“簡雅平淡的風格”，反應了這種時代的需求，而且一方面具有了“文章爲士子所效習”的“典範”作用，更兼“指示了衆人可習的門徑”的“法式”功能。因而在“掌握有力的工具——知貢舉”的便利下，憑恃其“善處人事”、“胸襟寬濶”的特殊性情，在“提携後進不遺餘力”的精神感召中，達到了古文運動的成功。

接着歷述蘇軾的代興繼起，踵事增華，達到了“古文最高藝術層次”，但也埋伏下了盛極而衰的根由，因而在歷經黨爭、洛學的攻擊，終於內外交困，再難振作，古文運動遂及北宋而止，南宋再無大家繼起。整個的分析，遂具有從驚天動地到寂天寞地的悲劇情調，在低迴掩抑的終曲聲中，我們只聽見《餘論》裏何先生諄諄致意於黨爭之害：“古文之被提倡，本有政治上的目的，但此一政治性係限於冀求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，並不同於黨同伐異的鬥爭工具。”“古文淪爲政爭的工具。”“古文被大量用於批評時政，譏刺人身，古文遂爲政治所污染，喪失了它的純淨。”“古文一旦用爲政治鬥爭，終必受到政治力量的傷害。”……餘音裊裊，發人深省。

江西詩派到了南宋猶能開啓四大詩家，終南宋一世而古文竟無大家。或許正在“古文運動”的“文道合一”原即出於經世致用的要求，所以“道”取“外王”之義，頗具進取精神。而偏安半壁的南宋，正如晚唐的疲於外患與黨爭，在苟且委靡的世風下，或許“內聖”之思與清苦之音更近於時代心理，古文的復興遂有待於明、清的有心用世之士。但是古文終究於北宋之後成為文體的正統，歐、蘇的努力亦可算功不唐捐了。

何先生雖然對於蘇軾的“重詩賦，文章亦求華美”，“蘇文縱橫徜徉，難以學習”，“蘇文頗軼儒家之道”，東坡的未為粹然純儒，而導致古文運動的盛極而衰，略有微詞，遺憾之意溢於言表。但這其實也是書中重點之一的“道統”與“文統”的能否融合為一的關鍵。早期的古文家所以只好走怪奇艱澀之路，就是他們只能“宗經”而無法“變騷”，不能融攝戰國以下，縱橫、屈宋、班馬等等在文風上的發展，因此只能在一種極端有限的文體中艱苦掙扎。歐陽修變怪奇為雅正，化艱難為平易，自是為古文開出一條可行的新路。但是平淡若無真味為內裏，終究有失為文的本義。並且若一味強調平易，亦未嘗不是另一種有限而拘束的風格。書中所探討的二蘇的“文意”與“文氣”的主張，正是想藉由“有德者必有言”的理念，突破文主一格的拘限，想以人心思感的自然流動——“意”之流變多姿，以及性情閱歷的寬厚豐富——“氣”之宏博疏蕩，來充溢平淡自然的文字，而達到有文有質的風格。事實上這正是古文文體的再次解放，而終於找到了真正足以反映性情，自由表現的美學基點，也就是古文的足堪擔當宋代之後文體之範式的活水源頭。所以，何先生亦一再強調蘇軾“造就古文最高藝術層次”，“在藝術成就上，蘇軾的確推古文及於顛峯”——雖然何先生對於“波瀾壯闊、變化萬千之文取代了清新平易之文”，站在為古文運動設想的立場，評價上略有保留。

何先生另闢的一章“與唐代古文運動的比較”以及“北宋古文家與釋子之交涉”、“古文家與理學家之交涉”兩篇附論，無疑使得本書

的脈絡更加清晰完整。尤其唐代古文運動雖然出以比較，敘述卻是詳備完整。通觀叢列，不但是本書的基本寫作方式，在第二章頁三十六注二檢討郭紹虞論北宋文論之不當的這段話：

郭氏的偏失可能肇因於立論之時僅就個人論文篇章著眼，而未從史傳、文集綜合觀察他們的思想、言論，甚至行為；尤其未能將文學現象置於全文化、全社會現象檢視，這很值得我們警惕。

更是充分地反映了本書的寫作態度。是以本書在材料掌握上的周備精密，分析探討上的深入細膩，其足資學者的參考應用，自不待言。而透過“排佛”，何先生強調了古文運動的本位文化意識；談到了“理學家”對於“古文家”的抨擊，則強調了儒門的同室操戈的不無遺憾。但釋契嵩在本書中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反派角色；而批評蘇軾的朱熹則位同“聖人作而萬物睹”的儒道“聖賢”，雖有指瑕而大體服膺。似乎完全反映了何先生的深深涵泳於性理、文章兩全其美的儒學大傳統，以及傾向德言兼顧的中庸天性所形成的特殊襟抱，因此發為論斷，有所取而有所不取，俱見性情。

何寄澎先生自於臺大求學之日起，即為經常談文論學的好友。多年前本書初稿完成時，依稀記得彼此曾有熱烈討論，當時惟願見其早日刊行。現在終於正式成書出版，真是可喜可賀！付梓之前有幸重閱，依舊興味盎然，可見學問的累積，雖因歲月而異，但流露真生命真性情的文章，自然永遠動人！是為序。

柯慶明 謹序

於臺灣大學

中文系三〇八研究室

原版自序

本書是我過去研究生涯中階段性的工作成果之一。現在看來，似乎仍有不少的疏失，但爲了表示對那段歲月的紀念，除非明顯的錯誤予以更正修訂外，見仁見智的意見便仍保存原貌。我個人認爲：曾經那樣存在過的，就讓他那樣存在吧。不只是紀念，也是一幀驗證——驗證著自己面對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否依然誠實敬謹，依然充滿活力、不斷進取、不斷突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書的寫作方式與風格，頗受劉子健先生《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》一書之影響。見賢思齊，見不賢而內自訟，本來是從事學術研究者應有的態度。

我個人相信，本書除了可供研究宋史、宋文以及宋代思想的學者參考之外，對於現代的人生與社會也當有借鏡、啓發的作用。畢竟人心不遠，古今相通，一個活潑潑的文學運動的生命力怎麼可能不震撼我們的心靈，激盪我們的智慧，昇華我們的生命情調與意志呢？回憶我個人撰作本書的當時，確實時時充塞著這種心情與體會；直至今日，當我重閱本書（尤其第四章以後），也依然有著相同的強烈感受。

謝謝好友柯慶明教授爲本書作序；謝謝家人長久以來給我的支持；謝謝所有該感謝的人。

何嘗澎 謹序

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

臺大中文系十二研究室

新版自序

本書是我的博士論文，完成於一九八四年六月，八年後（一九九二年八月），始由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出版，並獲嘉新優良學術著作獎。近年，由於臺灣出版業不景氣，學術論著尤其乏人問問，本書遂告絕版。今承上海古籍出版社不棄，願重新付梓，於我個人而言，真是莫大的榮幸。

我在碩士期間，研究的範圍是唐詩，及至入博士班，業師葉慶炳先生囑以宋代古文為研究課題，乃由詩入文。一直到今天，我關注的重心始終偏向散文此文類，唯不僅限於古典，亦兼及現當代而已。之所以如此，恐怕與個人長年講授中國文學史，乃格外注意古今之流變與通貫有關吧？

就我有限的觀察，古典散文雖在先秦已臻成熟，但歷經東晉以下駢麗美文之抑制與刺激，至唐韓、柳始吸納轉化前此之衆美，創變出真正寫作多元而富有個性的“一家之言”之新古文；宋代歐、蘇繼之，無非更為平易、更為多樣、更具情感與理辨之趣味而已；南宋以下，格局日蹙，筆力日卑，平心而論，漸無足觀。我個人一直認為，古典散文最宏闊之格局、最豐廣之內容、最動人之書寫，具見於唐宋大家，其影響固不僅限於明清，抑且被於今日——這一點，只要吾人細細品讀胡適之說理明暢、魯迅之批判辛辣、周作人之閒雅平淡、余光中之縱橫恣肆、楊牧之敷愉容與……便不難體會彼等或承唐、承宋，或兼取唐宋之筆法、格調，而以余言為然也。我個人這樣的認知，雖平常無奇，亦實積累多年閱讀心得而來，儼然入好之、樂之境界——

而這些，追本溯源，都來於寫作本書時所開啓之心智、所引發之志趣；同時，這樣的認知也一直幫助我堅定地繼續既返求深探古典，復前瞻梳理現代，構成我學術生命的風景，心中的篤定與溫暖又豈是外人所易了解的？

我常常敬謹莊重地回憶當時寫作本書的情景：每天一絲不苟、一成不變地自早晨八點寫到晚上十一點——在那四壁被陽光烘熱的小閣樓裡，揮汗書寫，一百天的時間，竟然完成了二十餘萬字的初稿。那樣的毅力、那樣的工夫、那樣的效率，如今想來，真是不可思議！我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有那樣的“成績”了。

我亦猶記口試本中，臺師靜農密密的眉批、旁注，他逐字逐句審閱文稿的精神令我至今依然感懷不已，哲人風範固不可及！後來我即以《釋契嵩對北宋古文家排佛的反應》為題（內容大抵即本書中附論壹、第一節內容）發表演講，通過留系任教。

時光荏苒，歲月易得，當年的喜悅、興奮，猶自溫然可感、宛如昨日，一轉眼，亦竟離卸職退休之日不過數年而已。此中情懷，難以言宣。然而，不論如何，本書能在此時重新問世，對個人而言，意義非比尋常——那不僅是學術歷程的再觀省，也是生命內涵的再觀省，在此，特別要對趙昌平先生的惠助以及杜東嬌女士的辛勞，致上最深的感謝之忱。

付梓之前，反覆校讀本書，決定除改訂若干異文、脫漏、訛誤外，悉仍舊貌，原因無他，唯企圖保留當年的我的所思所見所感而已，知我罪我，固不措懷矣！而我個人依然相信，本書對有心研究唐宋古文的後起者而言，當仍有其參考的價值；甚且假以時日之後，對其藉以觀省整個古典散文傳統之變化以及評覲現當代散文之得失，亦有其啓發的功能。是為序。

何壽彭 謹誌

2010年12月15日

前 言

“北宋的古文運動”，雖爲人所熟悉，但被了解的程度似乎並不充分。類似這種耳熟、眼熟，其實卻未必詳之的例子，在中國文學史上正復不少；對有志獻身文學史研究的人而言，將其深入探討，董理清晰，固爲一極有意義的工作。作者選擇“北宋的古文運動”爲研究對象，最重要的原因在此。

晚近以來，學者有關北宋古文運動的研究，除金中樞《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》^①最具系統外，其餘多屬古文家個別之觀察。這種“點”的研究工夫，固有其價值，但對了解整個運動的性質以及發展過程，則無太大的幫助；至欲進一步了解到北宋古文運動與其他——諸如政治、學術等之關係，則距離更遠。金氏之文雖有較全面的觀照，可惜仍嫌簡略，並且全從理學觀點看古文運動，^②也不免有偏。本書希冀能對這些研究上的缺憾有所彌補。

不過，由於北宋的古文運動牽涉層面甚廣，它與經學、史學、儒學以及政治等都有關係，正如陳子展所謂——“尊孟韓以立道統，闢佛老以明正學，抑詩賦以放文敝，重事功以備世急，倡師道以崇教

① 載《新亞學報》五卷二期，一九六三年八月。

② 金氏此文係經錢穆先生指導，觀點偏向學術史，文中處處可見其自理學家觀點看古文運動，如其云：“歐公論文，一本韓公，而並亦與理學家相近。……唯其深明此理，故能不以能文爲已足，而以‘士志於道’是從。”其結句又云：“古文家的文學觀與理學家的文學觀，蓋本同而未異。近人不加深察，妄肆詆毀，此文學之所以日衰，而世風之所以日下也。”皆可爲例證。

化，務篤行以重實踐。”^①對如此涵義深廣之運動，欲做全面深入之研究，並盡發其內蘊與真相，當非數年之功所可一蹴而幾，本書因而暫求先明此運動之性質以及發展過程。嚴格說來，這只是北宋古文運動全面性研究之初步而已，其中雖亦觸及其與政治、學術之若干關係，然距翔實深入尚遠；這進一步的研究，唯請俟諸將來。

在方法上，本書之撰述係從四方面入手：一、運動的時代背景；二、運動的理論基礎；三、運動的發展歷史；四、與唐代古文運動的比較。經由第一項探討，吾人可以掌握運動的原始性質，但對此一性質之是否有所轉變以及如何轉變則不得而知，故必有第二項之探討。經由第二項探討，吾人一方面可以印證前項的結果，一方面亦可以透過對理論轉變的觀察，掌握到運動性質轉變的狀況。至此，吾人已能對運動原始的性質及其轉變有一大致體認，但尚非十分具體而確定；尤其對運動的發展過程仍然毫無所悉，故必有第三項之探討。經由第三項探討，北宋古文運動之興衰變化固可得知；而各個運動從事者所應得的評價與地位亦可從而確定；至於前此對運動性質的掌握，固可以更為落實；由是，本論文寫作之目標庶幾乎達成。至於第四項之探討，主要基於北宋古文運動乃繼唐代古文運動而起，就文學史研究的立場而言，二者之間有何同異，自不能不加以追究探索；何況就本研究之目標而言，此項工作之完成，依然有助吾人更清楚地確定北宋古文運動的性質——換言之，更印證了前面諸項探討的結果，增加了本書研究的周延。

在此應予提出說明的是：就本書之研究而言，將此一運動的創作品——即古文本身，做細密的分析探討，仍有其意義。但由於此項工作本身即為一龐大的文學批評工作，宜予單獨進行；加以本書之側重點乃在“史”的交代，故文中只在必要之處對作品或予分類，

^① 見氏著《宋代文學史》，頁七。唯陳氏此書余未見，此係轉引自劉子健《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》，頁八七。

或加分析，並不作更詳細之探討，這一點請讀者諒察。

此外，本書另附附論兩章，分別討論北宋古文家與釋子之交涉以及古文家與理學家之交涉。前者關係北宋古文運動重要目的——排佛之是否達成；後者關係北宋古文運動發展之氣運，且亦同時牽涉到與北宋古文運動有關之諸問題——如道統之爭等，二者皆有闡述之價值。緣於問題曲折，不便悉於文中交代，不得已乃入諸附論。

至於本書所依據之資料，則主要有三部分（不包括唐代部分）：一為宋人文集；二為宋代史籍；三為宋人說部。前兩項為了解運動之理論以及運動之時代與社會所必賴；第三項則在對個別古文家的考察上有重要意義——而這一點的掌握，最後仍歸結於運動的發展；換言之，各個古文家的個人因素仍然會對運動的整體有輕重不同的影響，因此不能忽視。應予說明者：本研究所以不避采用說部資料，乃因筆記小說所記故實，於“細節上”容有誇示，但所反映的“現象”則大體可信，尤其有不少正可與正史傳記相發明，如：王禹偁，《涑水紀聞》卷二說他“性剛狷，數忤權貴”，《宋史》二九三本傳也說他“頗為流俗所不容，故屢見擯斥”。穆修，《東軒筆錄》卷三說他印柳文，於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，言語傲忽，經年不售一部；《宋史》四四二本傳也說他“剛介……人欲與交結，往往拒之”。事實上，正史傳記往往采取筆記小說之記載，而略去其細節描繪而已。

此外，對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亦不敢忽視。這其中，羅師聯添先生、劉子健先生、金中樞先生，以及日本學者諸橋轍次先生、麓保孝先生等的論著給我的啓發尤多。學術研究本是日積月累，代代相傳的工作；當清晰地感覺到前輩學者謹嚴的治學風範時，對我個人的鞭策是無限的。

宋人載籍浩繁，各問題間之關係又極錯綜複雜，本研究有鑒於此，雖將目標懸之已低，但寫畢之後，仍覺未至之處頗多，唯一值得告慰者，撰寫過程之中，已深切體會研究宋代之趣味，方向既定，則

路途之遠近曲直固已不能動搖心志矣。

本書寫作期間，承蒙葉師慶炳先生悉心教誨；又蒙諸師友關懷：或提供意見，或賜借資料，在此謹致由衷之謝意。